

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①

段成荣¹ 邱玉鼎²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库, 本文分析了从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和来源地的变化。发现在华国际移民的情况受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管理政策的影响, 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变动阶段。目前, 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仍然较小, 但其绝对存量从1980年前后开始迅速增加, 来源国也更加广泛。未来中国可能会迎来国际移民流入的大潮, 需要尽快开展国际移民相关的研究, 做好在华国际移民的信息采集、识别和管理工作, 有针对性地做好在华国际移民管理预案。

[关键词] 国际移民迁移; 国际移民来源地; 国际移民管理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23)02-0001-11

1 引言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国际移民的存量在过去数十年之内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统计, 国际移民存量从1960年的7188万增加到了2020年的2.81亿, 已占世界人口的3.6%。其中, 1.57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占全部国际移民的56%, 1.23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占全部的44%。国际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移民全球化”所带来的迁移运动剧烈影响^[1], 国际移民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渐形成对国际人口流动的“拉力”。同时, 中国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 在经济和政策的三重影响下, 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国, 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开始进入中国工作、学习和投资^[2]。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31个省、市、自治区内共有超过84万外籍人员。

近年来, 与在华国际移民相关的事务也多次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2020年3月27日, 司法部对

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 20&ZD172)。

[收稿日期] 2022-10-21

[作者简介]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与城镇化、人口与发展、少数民族人口; 邱玉鼎, 通讯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流动人口与城镇化。

外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在华外国人成为永久居民的条例引起了广泛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如果该条例开始实施，可能导致更多外国人涌入中国。而在此之前，在华国际移民的规模、社会融入和受到的待遇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3-6]。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区国际移民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融入问题。广州及周边地区的非洲裔移民的迁移行为、居住模式和空间交往模式目前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当前研究发现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的迁居次数较多，受到政府管控大，具有国际移民早期阶段的发展特征^[7-8]；何亚平和骆克任、朱蓓倩等通过历史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总结了在沪日本人和其它国别的国际移民的迁移定居的历史沿革、人口结构和迁移模式，发现在沪日本移民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族裔经济，具有高度的空间聚集特征^[9-10]；居住在北京望京地区的韩国人同样形成了族裔经济模式，并且由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这也使得在京韩国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融入问题^[11-12]。

过往的文献对特定城市中特定族裔的在华国际移民研究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国际移民定义口径不一和数据缺乏等原因，仍然没有回应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在华国际移民规模、来源地及其历史变化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深刻时代命题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势必要面对国际移民进入中国的新局面，也必然要提前谋划关于国际移民的社会治理内容。而获得准确的在华国际移民规模信息是制定和规划国际移民相关政策的基础，对了解国际移民的基本情况、发挥国际移民带来的优势和处理国际移民可能带来的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多来源数据对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状况进行梳理，通过总结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和来源地的变动，概括不同阶段在华国际移民的空间特点，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发展态势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因两岸四地实际存在不同的移民管理机构，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移民管理政策，因而，若不作特别说明，本文在华国际移民的数量和情况实际指的是在中国大陆国际移民的数量和情况，并排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迁移到中国大陆的移民。

2 国际移民的概念和数据

在国际层面上，移民并没有普适性的定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任何改变其通常居住国的人”，常住地指的是一个人生活或者日常休息地方，为旅游、度假、商务、医疗或者宗教目的的临时出国并不意味着通常居住地的改变。联合国将国际移民分为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如果国际移民改变其常住地至少一年以上就被定义为长期国际移民，而改变常住地3个月以上，但不满一年者被定义为短期移民。

在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国际迁移的水平和趋势目前是通过移民存量(Migrant Stock)和移民流量(Migrant Flow)来衡量的。移民存量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出现在某一国家内曾经改变其通常居住地的国际移民总数，是一种静态的指标。移民流量是指的在特定时期内移入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Immigrants)或者是离开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Emigrants)。移民流量是动态指标，可能包括在给定时期内多次跨越国境线的移民。国际移民存量和流量数据对于分析国际移民的水平和趋势都非常重要，移民存量侧重于记录了国际迁移的累积影响，移民流量则记录了在迁移发生后不久特定时间段内的迁徙行为，因而更能够反映国际移民的最新情况。但移民流量口径往往

面临更为严重的数据缺问题,因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通过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移民的迁移模式^[13-14]。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下称 GBMD),除此之外,使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迁移存量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进行补充。二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均采用了移民存量来衡量国际移民。GBMD 数据库使用了 1000 多套国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数据来计算和估计 1960-2000 年间每十年的全世界各国国际移民的存量,并构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原籍地一目的地 232*232 迁移矩阵。该矩阵包括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地区、主要领地和属地,该数据中的国际移民使用联合国的长期国际移民定义,对其它相关指标也进行了相对应的说明。GBMD 的时间跨度为 1960-2000 年,共包括 5 轮数据,能够充分地反映在华国际移民在不同年份下来源国的时空变化。在 GBMD 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反映国际移民在中国的近况,本研究选取了联合国发布的 2010 年、2020 年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补充。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了多轮统计,但是初始轮次统计只是从 1990 年开始,对于国别的分类不够精确,针对在华国际移民而言,只能识别较少的来源地,但因其同样对迁移存量的总量进行了计算,并且时效性更强,因此可作为 2000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延续。

1960 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变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管辖范围被重新划定,而这也是影响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对 GBMD 和联合国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及排除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数据。

3 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历史变动情况

3.1 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历史变动情况

通过 7 轮数据的衔接,本研究覆盖 1960-2020 年共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历史变动的情况。近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经历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阶段,从 1960-198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逐渐下降,从 1960 年的 24 万人下降到了 1980 年的 5.4 万人。而从 1980 年开始,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逐渐上升,到 2020 年达到了 81 万人。整体变化呈现出明显的 U 型(见图 1),拐点发生在 1980 年。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在时间上的变化同中国的移民政策也就是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根本上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移民政策在改革开放开端经历了大的转型,改革开放前对在华国际移民持保守和防范态度,而改革开放后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限制逐步放开,近年来开始建立正式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总体上来看,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可以分为 1980 年前和 1980 年后两个阶段。

3.1.1 1960-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大幅减少

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迅速下降。196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存量为 24 万人,在 1960 年到 1970 年间就大幅下降了 62%,十年间减少了 15 万人。1970 年到 1980 年又减少了 3.7 万人,到 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减少到 5.3 万人,不到 196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四分之一。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措施,西方国家在华侨民存量大幅度减少。从 50 年代末开始,

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也逐渐撤离在华专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国际形势使得国际移民入境中国的居留需求很小。从建国之初到70年代末，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严格管理外国人在华的访问、就业和居住，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根据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实施“逐步挤走大部分，有意留下一部分”的驱挤政策^[15]。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法规，如1951年的《外国侨民出入境及居留暂行规则》，1954年的《外国侨民出境暂行办法》、《外国侨民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法》、《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和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这一时期关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依托于政策性的文件规定、法规和规章，以管控为主，不以外国人在华就业为考量点，对外国人出入境、过境、居留与旅行等在华期间的活动实施严格规范管理^[16-17]。总之，内外交杂的因素使得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从1960年到1980年间大幅减少。

3.1.2 198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逐步上升

1980年开始，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开始上升。1980年到1990年之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上升相对较为缓慢，10年间的增速为52%，到199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还没有超过十万。而从1990年到201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迅速上升，且增幅也在不断提高，1990年到200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就增长了153%，但在2000年时，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仍然没有超过1960年的数值。2000年之后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人口司。进入21世纪后前1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加速上升，2000-201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从20万上升到68万，增幅高达229%。2010-2020年，国际移民的存量继续上升，但上升幅度迅速减缓，10年间在华国际移民增加了约13万人，达到81万人，增幅为19.3%。

1980年后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的迅速上升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变迁。在21世纪前，中国针对外国人的管理方针经历了由“简化手续、掌握情况、重点控制”到“维护主权、保卫安全、服务四化建设”的转变。中国政府也出台新的关于管理外国人入境和出境的法律，198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与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等两部法律法规对外国人的入境要求、出入境证件检查、居留、住宿登记、旅行、出境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客观上放宽了外国人在华居留时间、活动范围的限制。同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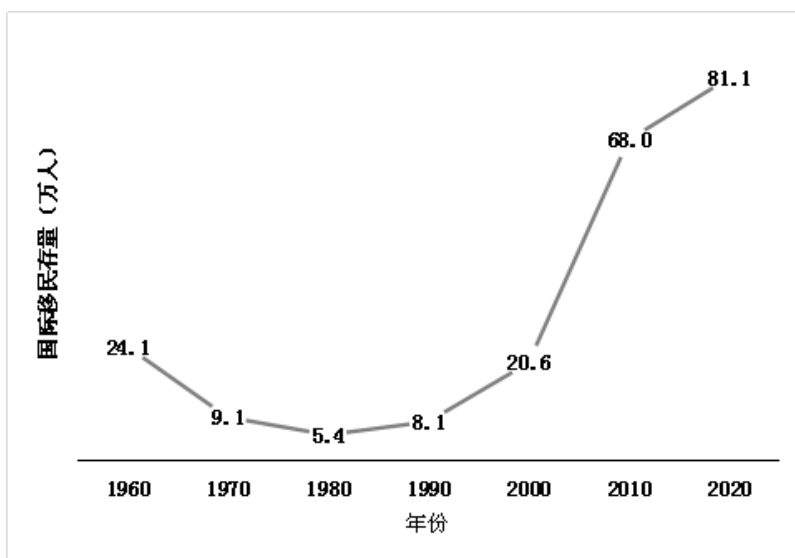


图1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1960年至2000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国际双边迁移库(GBMD), 2010、2020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下文图表来源同图1。

重用专家”^[18]。此后，外国专家引进工作正式开始：1980年国务院针对外国专家专门出台了《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实行条例》，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对外国专家的范围作出界定；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引进外来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引进国外人才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而在之后陆续颁布的《关于引进外国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1983）》、《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1987）》、《对外国专家奖励办法（1990）》、《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专家管理办法（1996）》等规定和办法则对外国专家的选定标准、生活待遇、保密问题、引进模式等进行了规定^[19]，以方便外国专家在华开展生活和工作。

21世纪后，随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我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脚步也进一步加快。2004公安部联合外交部发布施行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通过制度开始规范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2013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使得在华外国人的出境入境、签证签发、停留居留、调查遣返等事宜得到了全方位的完善。2018年，全国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的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提出要整合公安部门的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等职责，组建由公安部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同年4月，国家移民局正式挂牌，并全面负责全国移民管理工作。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命名和成立也标志着我国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官方概念从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外国人”正式转向到“移民”这一中性概念，针对国际移民专门的机构设置，标志着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朝着法治化、服务化、平等化推进。

3.2 在华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

从1960年到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的总体水平以及中国的总体人口的数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本文对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将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与国际移民存量以及我国人口总量进行了对比（见图2）。

60年间，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从7188万人上升到了2.81亿人，绝对存量增加了2.1亿人。而1960-2020年，我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比例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在变化趋势上同样呈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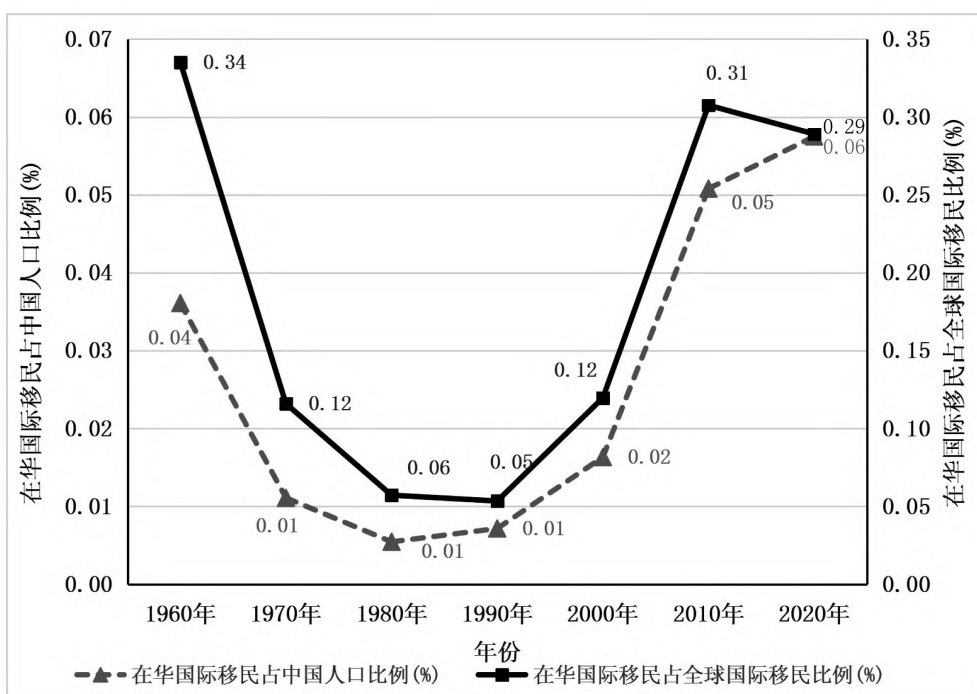


图2 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世界国际移民和中国总人口比例 (%)

U型。196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0.34%,从1960年到1980年,该份额下降到了0.06%,1990年和1980年所占的大致相同。随后在华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有所上升,到2010年达到了0.31%。尽管在2010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在2010年其所占比例仍然略微低于1960年的比例。201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出现了略微下降,占全球存量的0.29%。从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其变化的范围仍然是在小区间内,1960-2020年间,我国始终不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入地。

而从1960年到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相较于我国庞大且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基数而言,其所占的比例仍然是极小的。从1960年到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的相较于中国人口总量的比例始终都没有超过0.06%。因此,事实上中国还远不能被看作主要的移民输入地和移民国家。

4 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变化

4.1 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亚非拉,欧美澳等大洲占比较少

总体而言,按大洲区分的在华国际移民形成了两个相对较为独立的部分,一部分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组成,来自这一部分的国际移民在数量上占据了在华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另一部分由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组成,这一部分的在华国际移民的占比始终较小并且占比变化不大。从1960年到2020年,大多数在华国际移民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并且亚洲的比例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具体来看,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的占比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60年到1980年,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占比均保持在90%以上,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了小幅度的上升趋势(见表1)。这反映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于我国周边地区,长距离的国际移民数量极少,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源于积累的存量以及历史上大量迁移到东南亚华人当中的回流人口。但从1980年开始,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的比例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从1990年的86.9%下降到了2020年的70.9%,反映出中国对于国际移民的吸引不再仅仅局限于亚洲地区,而是向其它大洲扩散。这客观上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尤其是和世界其它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来到中国经商、就业、就学。在这一阶段的国际移民存量变化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变化最为明显。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在华国际移民占比在1980年及以前均不到1%,但是1980年后便迅速上升,来自拉丁美洲的在华国际移民占比在2000年后已经接近10%。来自非洲的占比在2000年后迅速上升,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15%。而在60年间,来自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在华国际移民的占比不大,都在5%以下,2020年,欧洲、北美洲、

表1 按大洲分的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占比(%)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亚洲	92.7	91.7	94.0	86.9	80.5	74.1	70.9
欧洲	2.4	3.9	2.4	4.0	3.1	1.0	1.2
非洲	0.0	0.1	0.0	0.1	0.4	14.0*	15.7*
北美洲	4.1	3.2	2.5	4.7	4.3	3.7	3.4
拉丁美洲	0.0	0.5	0.7	3.7	9.7	9.2	8.4
大洋洲	0.7	0.6	0.4	0.5	2.0	0.5	0.5
全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联合国数据中没有明确提供来自非洲的在华国际移民数据,本表中的数据根据作者通过联合国数据推算而来。

大洋洲的占比分别为 1.2%、3.4% 和 0.5%，同时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尽管这三个大洲都有过一定的上下波动，但整体上最大波动幅度均不超过 2 个百分点。

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的变动情况，基本符合国际移民一般的发展规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20-21]，人口迁移的产生是基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工资差异以及就业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历程。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了 10504 万美元，相较过去已经有了长足的增长。从流入地视角来说，相较亚非拉地区而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国际移民的能力。但是相比欧美澳等大洲的发达国家而言，仍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预计我国的国际移民主体仍以亚非拉地区流出的国际移民为主。

4.2 来源地数量先降后增，移民吸引辐射范围逐渐变广

1960-2000 年，按大洲级别地域来看，各个大洲（不包含南极洲）都有国际移民来到中国（见表 2），1960 年在华的国际移民来自 84 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和欧洲占据了这些来源地的大多数。1970 年相比 1960 年而言，在华国家移民的来源地数量还有所增加，这其中主要是来自于非洲地区。考虑到 1970 年前后大量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因此导致了更多数量的非洲国家有国际移民进入中国。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来源地最为稀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亚、欧、非三个大洲来到中国的国际移民国家和地区的数量都有较大规模的下降。1980-2000 年，来华国际移民的来源地迅速扩散，在华国际移民国家的来源地辐射更广，尤其是非洲大陆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际移民开始进入中国。到 2000 年，在亚洲除了没有记录来自马尔代夫的在华国际移民以外，其它所有亚洲国家都有在华国际移民。从国际移民来源地的变化看，从 1980 年开始，我国的国际移民的来源地也越来越广泛。这一方面来源于我国吸引国际移民的能力增强，同时国际交通网络日益发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移民从世界范围内迁移到中国。到 2000 年，在华国际移民共来自全球 167 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4.3 朝鲜半岛始终是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源地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见表 3）。在 1960 年，来自韩国和朝鲜的在华国际移民共占据了全部在华国际移民的 90%。这种情况可能是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生活着大量的朝鲜族，其语言和生活习惯同朝韩两国一致，不少家庭中也有跨国的亲属往来，因此导致了大量的朝韩出生的人口进入了中国。第二，朝鲜半岛在 1960 年前屡遭战乱，从朝鲜日据时期开始，朝鲜半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由于战争导致的移民和难民可能大规模的进入了我国东北地区，导致了在 1960 年，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来自朝鲜半岛的国际移民。但从存量上看，来自朝鲜半岛的在华国际移民对我国的影响在不断的减弱，从 1960 年开始，朝韩两国所占比例从 90% 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42%，而这主要是由于在华韩国移民的存量下降导致的。而来自朝鲜的国际移民在 1960-1980 年间相较其它国家而言，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这 20 年

表 2 按大洲分的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数量（个）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亚洲	32	33	23	31	46
欧洲	25	25	14	25	35
非洲	11	26	3	18	47
北美洲	2	2	2	2	2
拉丁美洲	7	8	8	24	23
大洋洲	7	4	2	7	14
全球	84	98	52	107	167

表3 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国(地)的变动情况

序号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1	韩国	179624 (74.6)	韩国	60214 (66.2)	韩国	22491 (41.9)	韩国	32282 (39.6)	韩国	47152 (22.9)	越南	300897 (44.3)	越南	303095 (37.4)
2	朝鲜	39389 (16.4)	朝鲜	17673 (19.4)	朝鲜	21672 (40.3)	朝鲜	31900 (39.1)	朝鲜	40337 (19.6)	韩国	107940 (15.9)	韩国	144831 (17.9)
3	美国	8807 (3.7)	美国	2804 (3.1)	菲律宾	1680 (3.1)	美国	3469 (4.3)	菲律宾	17828 (8.6)	巴西	42931 (6.3)	巴西	57602 (7.1)
4	英国	4098 (1.7)	英国	2513 (2.8)	美国	1188 (2.2)	巴西	2409 (3.0)	巴西	16246 (7.9)	菲律宾	42227 (6.2)	菲律宾	56657 (7.0)
5	前苏联	2483 (1.0)	前苏联	971 (1.1)	英国	1082 (2.0)	菲律宾	2321 (2.9)	泰国	14829 (7.2)	印度尼 西亚	22963 (3.4)	印度尼 西亚	30811 (3.8)
6	澳大利 亚	1643 (0.7)	马来 西亚	937 (1.0)	印度尼 西亚	787 (1.5)	英国	1743 (2.1)	印度尼 西亚	8586 (4.2)	美国	15475 (2.3)	美国	20762 (2.6)
7	加拿大	998 (0.4)	新加坡	888 (1.0)	泰国	666 (1.2)	泰国	767 (0.9)	美国	7748 (3.8)	泰国	8780 (1.3)	泰国	11779 (1.5)
8	日本	971 (0.4)	印度	826 (0.9)	越南	580 (1.1)	日本	611 (0.8)	马来 西亚	7278 (3.5)	秘鲁	7792 (1.1)	秘鲁	10455 (1.3)
9	葡萄牙	561 (0.2)	菲律宾	739 (0.8)	马来 西亚	514 (1.0)	马来 西亚	548 (0.6)	新加坡	6179 (3.0)	英国	5264 (0.8)	英国	7061 (0.9)
10	法国	388 (0.2)	澳大利 亚	461 (0.5)	日本	487 (0.9)	葡萄牙	402 (0.5)	印度	5767 (2.8)	印度	5183 (0.8)	印度	6953 (0.9)
	其它国家 和地区	1960 (0.8)		2873 (3.2)		2506 (4.7)		5018 (6.2)		34330 (16.6)		120136 (17.7)		161196 (19.9)

间,虽然其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不断波动,但占比却是不断上升的。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多其它国家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来自朝鲜的国际移民比例从1980年开始也随之下降。

4.4 欧美国家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变动较大

在1960年,我国仍然存在一定数量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移民,但1960-1980年间,来自这些国家的国际移民急剧减少,其中在华的美国国际移民下降了86%,到1980年,只有1000余美国国际移民还在我国境内,这与1980年前我国特定的外交政策有关。而从1980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开始回升,美国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从1980年1000余人回升到2000年的7000多人,其后近20年,在华美国国际移民大幅增加,在2020年有2万余人,其它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见表3)。

4.5 东南亚国家来华猛增,部分新兴国家需重点关注

从1970年开始,来自我国其它陆上和海上邻国的国际移民存量也在不断上升,例如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中以越南和菲律宾上升的幅度最为迅猛。越南从2010年后便一跃成为联合国数据中我国第一大国际移民来源地。2010年和2020年,越南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均超过了30万人,且占比超过了35%。而菲律宾的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则从1990年的2000余人上升到了2020年的5.7万人,已经是我国第四大国际移民来源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同我国关系密切,民间有较多的往来,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的跨境贸易极其发达,加上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大量的外籍劳工前往其它国家工作的传统,这二者共同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华国际移民的增加。

从 1990 年开始,巴西就成为了在华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从 1990 年开始,在华的巴西国际移民存量就迅速增长,在 2000 年就超过了 1 万人,在 2020 年甚至达到了 5.8 万人,已经占据所有在华国际移民存量 7%,是我国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巴西在地理上与我国距离遥远,且没有向外大量输出国际移民的传统,因此,巴西的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异军突起值得特别的关注。

5 结论和讨论

从 1960 年到 2020 年,中国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经历了从严密管控外国人的到逐步放开针对外国人的管控措施,然后发展到开始确立在华国际移民专门管理机构和开始全面制定在华国际移民相关管理机制的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在这 60 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随着政策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 1980 年之前,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不断下降,来源地的范围也在缩小。而 1980 年之后,更为准确的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华国际移民的数量不断上升,增长速度也不断加快,我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投资。尽管在华移民的相对存量长期以来还是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从改革开放之后在国际移民的增长态势看,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增长,甚至是大幅度的增加。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对国际移民的“拉力”,我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是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 年全球经济有所衰退,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全年 GDP 增长为正数的国家,中国 GDP 总量比 2019 年增长 2.3%。从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疫情防控形势来看,我国国际移民的“拉力”进一步提升。虽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国际移民浪潮处于低谷期。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好转后,国际交通商贸开始恢复到正常的状况,我国可能迎来国际移民迁入的浪潮。

尽管当前在华国际移民的规模还相对较小,但其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人口流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再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造全球人才高地”。这意味着,在我国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不仅需要激发国内创新活力,同时也需要从世界各地广纳英才。如何吸引国际移民,吸引什么样的国际移民,怎样做好国际移民的融入和制度安排,将是我国未来在全球人才的竞争和挑战中,必须要面临和解决好的问题。

总之,我国即将从一个没有国际移民,不了解国际移民,不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向一个有大规模国际移民,需要了解国际移民、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转变,必须快速适应这一转变^[22]。为了更好的解决在华国际移民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更好的促进在华国际移民融入中国、发展中国,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迅速开展全面系统的在华国际移民信息采集、识别和管理的工作。从过去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动发展经验看,全世界普遍都面临国际移民信息采集难、识别、管理难等问题^[23-24]。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确立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对象,即在华移民的口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在华国际移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区分和定义。在本文使用的两种

不同数据来源中,均没有对在华国际移民做出统一和准确的定义,这也就导致即便在相同的年份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甚至是相差较大的情况。因此,需要迅速确立在华国际移民的准确定义,这样才能为全面系统的开展在华国际移民的信息收集管理工作打好基础。除此之外,需要全面推进在华国际移民国际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国际间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协调,共同建立起统一的国际移民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对比和更新机制,提高国际移民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准确把握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

第二,尽早启动国际移民领域的理论性、基础性和政策性的研究,同时要注意国际移民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我国学界和社会对于国际移民的了解不多,对于国际移民的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形成机制、社会影响都缺乏系统和完善的了解,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度演变、社会心态等方位的考虑,厘清在华国际移民的情况。同时需要关注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的共性、特性研究以及欧洲北美面临国际移民管理困境的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做到未雨绸缪。另外要加强各单位、机构之间的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共享,积极推动国际移民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

第三,有针对性的建立和完善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预案和制度安排。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对于劳动力的多元化需求,越来越多的移民流入我国,在部分边境地区时有偷渡和人口贩卖发生,在一些主要城市也已经形成了移民聚集地,关于在华国际移民引发的社会事件并不鲜见。因此,针对在华国际移民,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建立在华国际移民处理的预案,并且逐步建立起人性化、法制化的制度安排。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移民,要严厉打击,从源头上制止边境偷渡和人口贩卖的活动,对于合法的在华国际移民,要采取弹性化、差异化的管理方法,对于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状况要有充分有效的处理方案,既要做好服务,也要做好管理。

[参 考 文 献]

- [1] ARANGO J. Explaining Migration: A Critical View[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0(165): 283-296.
- [2] 梁在,王楠. 中国和 21 世纪的国际移民研究[J]. *学术月刊*, 2021(8): 123-134.
- [3] 岳经纶,尤泽锋. 在华国际移民能享受社会福利吗?——基于公众福利态度的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134-145.
- [4] 李树茁,薛琳,宋雨笑. 新时代在华国际移民的融合、发展与治理[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13.
- [5] 杨靖旻,杨雪冬. 新时代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治理的逻辑与展望[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3): 74-83.
- [6] 王辉耀,苗绿.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38-57.
- [7] 梁玉成.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3(1): 134-159.
- [8] 李志刚,薛德升, MICHAEL LYONS 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8(2): 207-218.
- [9] 何亚平,骆克任. 上海跨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以在沪日本人和赴日返沪人员为例[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53-60.
- [10] 朱蓓倩. 上海外籍人口城市融入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6:42.

- [11] 周雯婷, 刘云刚, 全志英.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6 (4): 649-665.
- [12] 张磊. 韩国人在中国的融合与冲突——以北京的望京社区为例 [J]. 城市地理, 2015(8): 16-17.
- [13] CZAIIKA M, DE HAAS H.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4(2): 283-323.
- [14] BEINE M, DOCQUIER F, ÖZDEN Ç. Dissecting Network Externalit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2015(4): 379-408.
- [15] 柯卫, 雷宏. 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外国人证件管理的变化 [J].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2): 65-70.
- [16] 刘云刚, 陈跃.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移民政策: 评述与展望 [J]. 世界地理研究, 2015(1): 1-10.
- [17] 李明. 在华外国人居留制度问题研究 [D]. 南京师范大学, 2019:3-4.
- [18] 于光华.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M].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234.
- [19] 高子平. 我国外籍人才引进与技术移民制度研究 [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79-87.
- [20]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2): 139-191.
- [21]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69(1): 138-148.
- [22] 段成荣, 谢东虹, 王涵等.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国际人口迁移: 三论人口迁移转变 [J]. 人口研究, 2020(5): 33-43.
- [23] 庞丽华. 国际人口迁移的概念和测量——兼论中国国际人口迁移趋势 [J]. 人口与发展, 2018(1): 54-63.
- [24] 路阳. 国际移民新趋向与中国国际移民治理浅论 [J]. 世界民族, 2019(4): 58-72.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China:1960-2020

DUAN Cheng-rong¹, QIU Yu-ding²

(1.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Using the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stock and origin area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20. It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China is affected by both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stages.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stock is still small relatively, but the absolute siz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from an increasing variety of countries since 1980. In the future, China may experience a large wav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relevant research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for an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futur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ve policies